

绪 论

一 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祖国的东北地区，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东四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肃慎族、古朝鲜族、东胡族、夫余族、高句丽族、乌桓族、鲜卑族、室韦族、奚族、契丹族、靺鞨族、女真族等等，都曾生息繁衍在这块富沃美丽的土地上。

东北地区的各个古代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和中原历代王朝以及华夏一汉族人民在族源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和渊源关系。东北地区纳入祖国版图的历史非常悠久，因此，东北地区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生息繁衍在这片热土上的古代东北各族，当然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东北民族史也是中华民族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换句话说，东北民族史就是中华民族史研究中的一项专题研究。

由于祖国的东北地处边疆，位于东北亚的中心区域，在亚洲，乃至在世界上都占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着重要的经济、战略意

凡本书脚注中出现的书籍的出版社及出版年代请参见书后所附“主要参考引用书目”，不再一一标注。

义，故在鸦片战争以后，这里就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进行角逐的热点地区。帝国主义的许多御用“学者”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炮制了种种谬论，任意歪曲我国东北历史；捏造种种谎言，离间东北古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在民族起源上，他们不顾基本事实，否认东北古民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大力强调所谓东北古民族的“历史独立性”，居心叵测地宣传东北古民族的所谓“文化源头”就在东北地区，而与中原地区毫不相干。如此等等。其意图，无非在为“东北不属于中国”以及“东北独立”制造根据，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先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得他们的这种研究才不得不有所收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们散布的流毒既深且广，受其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别有用心者，国际史学界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仍然是将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与中国割裂开来研究，进而论述其所谓“独立发展过程”。如某国史学界自 60 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用考古资料解释东北古民族独立发展的文化源头在黑龙江史前文化的论点；某国的一些学者拦腰斩断夫余、高句丽以及渤海王国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关系，认为夫余、高句丽、渤海诸国不是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而是他们前人所建立的古代国家，并希望藉此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上述研究，或者歪曲事实，或者别有用心，所有这些，都需要我国史学界进一步加强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对东北古民族的起源问题，尽快作出客观、公正的回答，以肃清他们的流毒，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综合上述可见，研究东北古民族的起源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它丰富了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东北民族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个分支，而东北民族起源史则又是东北民族史中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史料，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揭示清楚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既解决

了东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又为编纂中华民族通史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更为中华民族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其次，研究东北古民族的起源鲜题，为进一步加强祖国东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根据。见于我国史籍记载的东北古民族，自先秦抵明清，数量几近百种。现在，其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主要融入了汉族之中。仅有一小部分，发展演变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朝鲜、蒙古等民族，同他们的前人一样，继续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边疆做着伟大的贡献。准确地描述出东北古民族的起源，考证出他们与祖国内地古族系的渊源关系，就可以进一步增强现在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凝聚力。

再次，研究东北古民族的起源，还可以正本清源，戳穿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和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研究者的谎言。使人们都知道，不但东北是中国人民的东北，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也同样是中国的古代民族，为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干扰与渗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二 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方法

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是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或者说，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课题。作为一个历史学科领域里的问题，当然这一学科领域里的一切研究方法对它都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研究对象，要想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再有所突破，并求得一条出新的途径，就必须在研究的方法上求得创新，寻求到一种更适合于这一学科特点

的研究方法。

自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我国许多的爱国史学工作者，在“强邻压境，国势阽危，金瓯已告残缺”的严峻形势下，积极开展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研究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针，在继承老一辈史学家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北民族史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再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今天继续从事东北民族史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继续不断前进的基础。

我们在充分肯定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并不是说这些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结论上都没有偏差和失误，若果真如此，也就失去了再行探讨的必要性了。在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数都存在着“单线”研究的倾向。所谓单线研究，就是仅就东北古民族自身的发展而研究。体现在族源上，就是未能揭示出东北古民族与内地古族系，特别是东夷族系的渊源关系。在论述东北古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时，着眼点往往多放在政治隶属、经济联系等方面，而常常疏于在族源上提出坚强可靠的根据。这样就致使这一领域里历史遗留的问题很多。

要想弥补这种偏差，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出新，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来探讨东北古民族的族源，应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张博泉先生曾说：“在东北古史的研究中，不能说所有问题都已研究得差不多，如果对东北史的发展作纵横比较分析，还会发现有许多问题应作新的研究与探讨。历史的比较方法，是扩

大眼界，广开历史研究途径的重要方法。^①这一论述既然是针对整个东北史而言，那么作为东北史分支的东北民族史也无疑是适用的，具体到东北民族史中的族源问题，也仍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方式中，有一种叫做“历史的比较”，或可称为“历史渊源上的比较”。它是指人们选择处在同一时代而又相互邻近的几个国家、几个民族或几个地区的社会作为对象，加以比较研究，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可以追溯到的共同的起源。这种比较的对象，限于有亲缘联系的事物之间，如英国人与美洲英裔移民之间的比较。

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如前所述，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前提，就是被比较研究的双方，要有“亲缘联系”；反之，则无从加以比较研究。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民族，与中华民族重要源头之一的东夷族系，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

第一，有史料记载的依据。东夷，是我国古代华夏族人对东方各族的泛称，现在的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全部、河南省东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地区，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域。在这个庞大的族系内，包容了众多的氏族、部族与民族。自夏至周，泛称九夷，《竹书纪年》中载其名者有：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而古代的东北各族，则被泛称为东北夷，自汉代以后，历代史籍皆有载述。东夷与东北夷既然都以“夷”相称，就已经在昭示着他们在族源上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唐代学者颜师古所说，所谓东北夷，也就是“东北之夷也”，^②是东夷的一部分迁徙到东北地区后的称名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汉书》与《三国志》在为东北古民族，也即东北夷作传时，传名不题“东北夷传”，而仍以“东夷”为名，称“东夷传”。并在

① 《东北古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第 1 辑，第 5 页。

② 《急就篇》注。

东北古族肃慎之前，直接冠以“东夷”一词，谓“东夷有肃慎之贡”^①云云。

第二，有考古学材料上的依据。早在史前时期，辽东半岛的考古文化就始终受山东地区，特别是山东半岛文化的强烈影响^②。考古学者们在总结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时，将东北地区辽东半岛的考古学文化归入大汶口—青莲岗文化系统中。在具体区系上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③。而现在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归属已经确定，它们都是东夷人的文化^④。众所周知，从理论上讲，一个文化共同体系的形成，需要有三个因素，即：地理的、历史的和民族的。东北与山东分属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如何解释这两个区域在考古学文化上所反映出来的一致性呢？比较稳妥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应该是它们都是同一族系所创造的文化。说得具体一点，它们都是东夷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文化。要追溯东北地区，特别是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渊源，只能到内地，特别是山东地区去寻找。因此，创造了东北地区，特别是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东北夷人，其来源主要是来自山东地区，来自东夷。

能够证明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有亲缘关系的材料当然还有许多，这在以后的各章中将陆续论述。有了如此之多的证据，探讨东北古民族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本书以“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立名，其遣题命意及发凡起例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①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② 参见刘俊勇《史前时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

③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

④ 逢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来探讨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揭示他们与东夷族系的渊源关系，是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应该始终遵循的一个方法，一个总的指导原则。至于具体的操作，还是要以考据为主，熔有关学科资料于一炉，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条进行分析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被比较双方，特别是东北古民族的有关情况。只有这样，他们之间的“同源异流”关系才能彻底明晰，才能使人信服。当然，我们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还应该特别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注意摆正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关系。尽管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资料有许多，但归根结底，不外是两大类，即文献方面的和考古方面的。“这两类资料都重要，不可偏废，互相排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文献资料需要有考古资料证实，而考古资料也需有文献资料论证，有时是互相补充、互相起作用的，有时是独自起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是等同的。”^①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终究是一个属于历史学范畴之内的问题，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文献资料是居于第一位的，而考古资料则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尤其是古代的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各族迁徙、征伐、兼并频繁，所以，东北地区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常常为几个民族所共有，如果只以考古资料为主去研究和推论东北古民族的起源，其结论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注意应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这三个传统学科，与民族学研究尤其是与民族史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以古文字学为例，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懂先秦史就不能研究古文字”，而且“要懂民族学”^②。我国先秦史

张博泉《东北古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第1辑，第7页。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第165页。

的一个重要内容，恰恰就是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兼并和融合的历史。所以，换一个角度说，不懂古文字，就不能很好地研究先秦史，就不能很好地研究民族学中的民族史。音韵学、训诂学之于民族史亦完全是如此。因此，老一辈的史学家，如郭沫若、丁山、王献唐、李白凤、于省吾、徐中舒等人，在涉及古民族的研究时，均十分注意运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考释其族源、族称及民族特点等。在研究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时，尤其是在揭示其族称含义时，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仍然是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以前，曾有学者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对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族称诸问题作过一些考证与研究。对其结论，学术界却多有微词，不少人认为其结论难以使人尽信，甚至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亦是有问题的。应该指出，这种看法有失公允。由于他们对古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在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所以才得出了上述结论。众所周知，上古时期书无定势，笔无定法，漆书行简，传见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这种情况，尤以见载的古族名及古地名为甚，所以，我们的古人早就有“夷狄之名，古书不必皆同”的结论。这样，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族称，见载于不同的史籍，就有数个不同写法族称的出现。如肃慎，又转写成稷慎、息慎、挹娄等；室韦，又作豕韦、穉韦等；邾，又作邾娄、疵、邹、訾、此、诸、屠等。不使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我们就无从知晓它们之间的嬗变关系，有时甚至会将一个民族认作是数个民族来加以研究。所以，在东北民族史的研究领域里，特别是在揭示其族源的问题上，脱离古文字学、音韵学及训诂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或者是对这三个传统学科在民族史研究领域里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注意摆正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在我国古代，存在

着族名与地名的同一关系。这种现象，愈古愈突出；越是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越明显。那么，族名与地名何者先有？回答当然是先有族名，地名则是族名的借注。“以部落名、族名指地，是普遍的借注方法。如东北原始居民‘肃慎’族称，到现代仍然用于指位。‘扶余市’的‘扶余’也是古扶余名的借注。”^①道理很简单，人类未去居住以前，一切地方都无名可称，人类居住以后，原始的地名才因族名而得。但由于我们的前人有意无意间搞错了族名与地名的前后关系，而称乌桓族名是因乌桓山而得，鲜卑族名是因鲜卑山而得，遂致有的学者推断乌桓族起源于乌桓山，鲜卑族起源于鲜卑山。并以此类推：扶余族名源于乌裕尔河名，其族源便在今乌裕尔河流域；古朝鲜族的族称源自汕水等等。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直到现在仍不绝迹。其后果，并不在于仅是颠倒了族名与地名的因果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人们对古民族族称含义的正确探讨，影响了对古民族族源的正确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偏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纠正。

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北民族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对东北民族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它同各学科发生广泛接触和联系。在研究中不是一重证、双重证，而是多重证，而是对相关的学科和领域要广泛吸收、引进和应用，以开拓东北民族的研究。”^②对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尤其应该如此。只要我们在研究的方法上，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既有整体，又有部分，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一定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创新，并能不断的求得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① 杨光浴《地名学简论》，第 57 页。

② 参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传》。

③ 张博泉《论东北民族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统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2 期。

三 有关研究东北古民族起源的史料与史学

探讨东北古民族的族源，揭示他们与东夷族系的渊源关系，如前所述，是一个从属于中国东北民族史学科范畴之内的问题。所以，这就从根本上界定了此项研究课题的史料范围以及借鉴国际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取向基点。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能依据的基本史料，首先应该是下述各类：

1. 历代史书著作。重要者为“二十四史”中有关东北古民族的纪、表、志、传；先秦史籍中的《竹书纪年》、《山海经》、《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周礼》、《逸周书》、《管子》等；编年体史书中的《资治通鉴》、《三朝北盟会编》等；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通鉴纪事本末》、《绎史》等；杂史中的《翰苑》、《路史》、《松漠纪闻》、《宣和奉使行程录》、《金虏图经》、《陷北记》、《乘轺录》、《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东夷考略》、《山中闻见录》、《绝域纪略》、《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龙沙纪略》、《朔方备乘》、《鸡林旧闻录》、《满洲源流考》、《东北边防辑要》等；方志中的《渤海国志》、《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开元志》、《辽东志》、《全辽志》、《盛京通志》、《吉林通志》等等。

2. 历代政书典志著作。重要者为“十通”中有关东北古民族部分；历朝会要、会典中有关东北古民族部分；《大金集礼》、《元经世大典》、《明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八旗通志》等等。

3. 丛书、类书著作。重要者为《太平御览》（内收有《肃慎国记》、《十六国春秋》）、《玉海》（内收有《肃慎国记》）、《永乐大典》（内收有《大金吊伐录》等）、《四库全书》（内收有《契丹交通史料七种》等）、《嘉业堂丛书》（内收有陆游撰《南唐书·契丹

列传》)、《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辽海丛书》、《玄览堂丛书》、《玉简斋丛书》等。

4. 金石文献。重要者为《满洲金石志》、《奉天古迹考》、《东北古印钩沉》、《雪履寻碑录》以及好太王碑、张建章墓志、崔源墓志、泉男生墓志等。

此外，对历代笔记文集、野史轶闻、文书档案、谱牒传记中涉及东北古民族的，亦不可轻视。尤其是对外撰史料，诸如《三国志记》、《海东绎史》、《三国遗事》、《东国史略》、《高丽史》、《东国通鉴》、《李朝实录》、《东国舆地胜览》、《栅中目录》、《建州闻见录》及《日本书纪》等，同样亦不可轻视。

如前所述，我国史学界对东北古民族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东北边疆的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亡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抱着爱乡邦御外侮的情怀而展开的。所以，早期（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研究成果，一般都针对性较强。概括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在史料的处理上，继承了乾嘉朴学传统，以考据为主；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注意探讨东北古民族与内地古族系，特别是东夷的关系，将东北古民族史纳入到中华民族史的范畴之内加以研究，注意东北古民族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如陈子怡的《中华民族的女系时代》，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奠定了我们研究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的基础。前者提出了东北古民族与东夷同族的观点，并认为东夷是东北古民族西迁山东地区的一支。后者则认为东北古民族包融于东夷之中，是东夷其中的一部分。冯家升的《肃慎系之民族》、《述东胡系之民族》，卞鸿儒的《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东北之史的认识》，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将东北古民族按各自特点分类，依类研究，求其族源，总成系统说。卞氏划分成三个类系：东胡、貉、肃慎。金氏则划分成肃慎、扶余、东胡。三位学者创建了第一个较完整的有关我国东北古民族

源流的体系，以后我国学者对东北古民族族源史的研究，大都不出于这一体系之外。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在对东北古民族的族源史研究中，侧重于钩沉和考证。方壮猷的《鲜卑语言考》，为探讨其族源，提供了语言学上的依据。金毓黻的《辽东文献征略》、《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反映了这一时期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及水平，为研究东北古民族的族源史，提供了一批集中的史料。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留下了一批丰厚的研究成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史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研究指导，在汲取老一辈史学家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把东北古民族族源史问题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动态探索，置于世界人类文化天地间作以全景观照，因而在史料与观点方面都有一些突破性进展。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干志耿等《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女真史》等。这一时期有关东北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亦用较多篇幅探讨了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如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董万仑《东北通史纲要》、佟冬等《中国东北史》（第1卷）；舒焚《辽史稿》、王承礼《渤海简史》、朱国忱等《渤海史稿》、杨树森《辽史简编》、张博泉《金史简编》、《金史论稿》、李殿福等《渤海国》、赵鸣岐等《东夏史》、杨旸等《东北古代社会》、耿铁华《高句丽研究文集》。这些研究论著既重视史料、典籍的一般收集、考证、校勘和注释，又能做到对史料的系统编纂、分析、综合和比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水平。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王慎荣等《元史探源》、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孙进己等《北方史地资料丛书》、《东北古史资料丛编》及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等，则反映了这一时期文献整理水平。另外，刘义棠的《中国边疆民族史》、陈槃的《不见于春秋大事年

表之春秋方国稿》等论著，其中的许多章节，都涉及到了东北古民族史问题，代表了台湾学术界的研究水平。

由于我国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更由于民族与疆域的不可分性，故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古民族开始给予高度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截止到现在，几乎有难以罄数之感。由于族源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所以，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专门以此问题为研究方向的虽然不是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东北古民族的族源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史以及民族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热点的转换，还是价值观念的取向，无不深刻受到本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局势变化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对族源问题的研究也当然是如此，可谓鱼龙混杂。在这里，笔者不准备过多地评论其史观和史学方法，只是对基本状况略作介绍。

一、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日本史学界对我国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与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崩溃密切相关。早期（明治初年至 1945 年）的研究，特点非常明显，就是为“满蒙独立”以及日本的军事占领寻找历史根据。这一点，沼田赖辅于《古代日满国交》一书中说得很明白：“使人人皆知日满两国之间在古代就有国交，并把它应用于对两国人民的教化。”矢野仁一在《近代支那论》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无国境论”，认为“中国没有国境之前而先有国家”，“中国自从同西欧各国开始接触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有了国境”。他们把研究当成了应变的殖民政策。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日本的史学界虽然以这种理论体系为研究的指导，但在对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所进行的具体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所得的结论，都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有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肃慎考》、《室韦考》、《塞外民族》、《自濊貊民族之由来论扶余、高句

丽、百济的起源》等，均收入《白鸟库吉全集》中。内藤虎次郎的《女真种族同源传说》等，收入《内藤湖南全集》中。松井等的《从文化上考察汉人与支那北方民族的关系》、《契丹勃兴史》等，前者于 1911 年发表于《东洋学报》，后者于 1915 年发表于《满鲜地历报告》。津田左右吉的《勿吉考》、《室韦考》、《渤海考》、《辽代乌古敌烈考》、《三国史记高句丽纪之批判》等，均载于《津田左右吉全集》中。那珂通世的《貂人考》、《高句丽考》等，收入于《那珂通世遗书》中。八木奘三郎的《满洲最古的文化民族》、《环渤海湾之古代民族》、《北满古今之诸民族》等前一篇自 1923 年至 1924 年分 3 次刊载于《调查事情》，后两篇于 1928 年刊于《满蒙》。池内宏的《高句丽之五族及五部》、《肃慎考》、《夫余考》、《勿吉考》等，均编入池内宏撰《满鲜史研究》中，箭内互的《蒙古史研究》。江上波夫的《石器时代之东蒙古》、《石器时代之东南满古》，1932 年发表于《考古学杂志》。岛田好的《奚、靺、白靺民族考》、《近代东部满洲民族考》、《锡伯封尔察部族考》、《清初萨哈连部考》等均发表于《满洲学报》。这些研究论著，一般都能在广泛收集史料（包括相关学科资料，诸如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以及民族志等）的基础上，进行较为严密的考据工作。所以，客观公正的结论，并不罕见。二战后，日本有关我国东北古民族的研究，多集中于最初的 50 年代。他们在前期的基础性研究之上，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同时，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经济的立场上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和田清、三国谷宏、日野开三郎、内田吟风、田村实造及鸟山喜一等。涉及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和田清的《唐代东北亚诸国》、《兀惹考》前者于 1954 年发表于《东方学》，后者 1955 年发表于《东洋学报》。1959 年，和田氏又发表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两部著作。另外，还曾于 1942 年发表《东亚民族发展史序说》刊载于《东亚史论丛》。三国谷宏的《涉

貊族小考》，1953年刊载于《朝鲜学报》。日野开三郎的《夫余国考》、《勿吉考》、《靺鞨七部考》、《小高句丽国的研究》均发表于《史渊》杂志。内田吟风的《柔然族史序说》、《丁令、柔然史二考》、《北方民族》等第一篇1950年收入《羽田颂寿论丛》，第二篇1958年收入《石浜古稀论丛》最后一篇1959年收载于《图说世界史》。另外作者还曾于1942年发表《山戎鲜卑考》一文，刊载于《史学杂志》。爱宕松男的《契丹古代史研究》于1959年出版。本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魏特夫首创中国历史“征服王朝论”这一理论体系亦影响到日本史学界。50年代，小林高四郎、小宫进均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而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并有所发挥的，则是田村实造和岛田正郎。他们在魏特夫理论的体系之上，正式提出所谓的“北亚历史世界”，从社会、经济、法制、文化等各方面，论述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辽、金、元、清与中国的“不相融性”，认为这些民族各自都有“独立”的文化源头，这一源头就在北亚，北亚地区存在着“独立”的历史世界。这些，田村实造在《关于中国征服王朝》、《北亚世界民族的类型》、《北亚世界的发展》岛田正郎在《辽朝的特点》及《辽史》等著作中阐述的非常清楚。我们可视其为前期“满蒙独立”论的翻版。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论述这些民族的族源问题，实际上却用其他方面的研究和结论，割断了这些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关系。这一时期，三上次男出版了《金史研究》，外山军治出版了《金史》。两部著作对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研究女真民族的族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苏联史学界的研究。苏联史学界的研究，承接于帝俄时期的研究基础之上。帝俄时代，自17世纪开始，在俄国档案中开始出现有关我国东北古民族的记述。但俄国文献中这类材料的大量涌现，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这是因为，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沙皇俄国以武力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璦琿条

约》和《北京条约》后，吞并了我国东北的广大地区，从而使世代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我国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成了跨境民族；另外一些，诸如费雅喀、恰喀喇、库页等民族，则完全划入了俄国境内。加强对这些民族及其历史的研究，有利于其政治上的有效统治。所以，当时俄国科学院及皇家地理学会一直注重对这些民族进行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民族调查材料，主要包括旅行记、档案、民族志、史料汇编等；另一类为民族研究著作。民族调查材料，主要有比丘林的《蒙古志》、《中亚古代民族史料集》、瓦西里耶夫的《10至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元明时期的满洲人史料》、《满洲志》、冯克的《黑龙江旅行记》；《西伯利亚及其毗连地区历史统计资料集》；米登道夫的《西伯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旅行记》；什连克的《黑龙江地区的异族人》；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阿穆尔省志》、斯特忍堡的《基里亚克人》、《基里亚克人、奥罗奇人、果尔特人、涅吉达尔人、爱奴人》等；波兹德涅夫的《日本北部历史及其同亚洲大陆和俄国关系史资料》；阿尔谢尼耶夫的《西伯利亚东部的民族学问题》等。这些材料，在我国历代史籍的大量记载之上，又揭示了许多新的事实，一些材料在一定方面对我国史籍有所说明和补充。这些调查材料很受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并称其为“关于东北亚民族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斯特忍堡关于基里亚克人的调查，被恩格斯肯定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亲自将其中的一篇翻译介绍给西方学术界。所以，尽管一些材料中存在着错误，存在着歪曲的理论和反动的观点，但仍不失为研究东北古民族族源问题的有价值的参考材料。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著作，主要是依据我国文献的记载撰写而成，此外，亦参证了当时的民族学、考古学资料。由于他们对我国文献的掌握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故所论多有缺欠和错误。代表著作主要有米勒尔的《西伯利亚史》、戈尔斯基的《满洲王朝的起源及初业》。这是俄国

第一部阐述远东古代民族历史的正式著作；格列宾希科夫的《满洲人及其语言与文字》、《根据考古学资料谈阿穆尔边区史的研究》等。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及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同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是世界民族的“博物馆”，对于研究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很有价值。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苏联又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其中阿尔谢尼耶夫的《乌苏里边区考古学与古文献学研究》，马特维耶夫的《渤海》、《远东边区史》、佐洛塔廖夫的《阿穆尔民族史略》等主要依据史料，特别是我国史料对这一地区的古民族进行了研究。洛帕京的《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沿岸的果尔特产人》，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佐洛塔廖夫的《乌耳奇人的氏族制度和宗教》等，则侧重以考查的方式，对有关民族的各方面情况进行研究和综述。史禄国的《通古斯人萨满教基础试考》，从研究宗教的角度出发，阐述了通古斯人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是西伯利亚与远东民族起源研究的一种史料》，依据发现的考古学材料，探讨了远东地区古今民族的族源。总的说来，苏联史学界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中文史料掌握不够，考古学资料认识不清，限制了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在历史学、考古学，还是在史料学方面，都无体系可言。正如佐洛塔廖夫在《阿穆尔民族史略》中所指出的那样：“对阿穆尔民族的过去研究得如此之薄弱，以至于目前尚无法对其历史作出多少连贯一些的概述。”二战结束后至 60 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学为突破口，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诸学科资料，对这一地区的民族与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主要论著有瓦西列维奇的《语言学资料与通古斯人的族源问题》，切鲍克萨罗夫的《关于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北方中国人及其诸邻》、《东亚居民人类成分形成的